

5. “人活着，就要不停地往上走”

高中时，郑章军看了一本书《谁动了我的奶酪》，他害怕不知不觉中自己就变得一无所有，立即草拟了一张计划表，催促自己不断努力。

在白纸上，他写了常常的一串：上大学——考研——工作两三年——出国继续学习——回国工作——从政——开自己的公司……现在他再回想起来，“真是一份宏大的计划”，当时虽然不切实际，却有挥之不去的激情。

谈到现在的计划，郑章军一脸严肃，显然已经深思熟虑，有了现实的考量。近期的目标是年底之前开个小饭店。起始的资金、租用的门面，他都准备好了，就差老家的亲戚过来帮忙经营。开饭店，主要是为了让内蒙农村里的亲人们能在北京落脚扎根，“这样他们既有事情做，也可以挣点钱”。

他还计划在五年之内，有自己的软件公司。“我有技术，又肯吃苦，肯定没有问题。”在公司里，同事们遇到难题，都会放下，但是他会“一直记在心里，不停地琢磨”，或者在网上的论坛和朋友们一起讨论，最终肯定都能解决。从不放过任何问题的他，在积累了软件研发经验的同时，也越来越自信。“软件公司，不需要太多的硬件设备，只要有技术，不愁接单子。”在公司里做虽然辛苦，但是可以积累经验，积累客户。“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可以单干啦！”

他打算开公司的时候，搬到条件好点的地方。每月一千多租金的房子比较合适，既可以更舒适地生活，也可以作为办公的场所。“接触的人群，素质也会高一些，”他说，“人活着，就要不停地往上走，做好手边的每件事，不能浪费时间。”

二里庄小月河的公寓，经常弥漫着他不能忍受的香烟味儿，还有从大学里带出来的懒散。他在大学时也有那样的室友——正午以后起床，吃个午饭，溜达一圈儿，心情好了就去上上课，到了晚上回寝室打游戏，通宵不睡，早上起不来，再正午以后起床……就这样循环着。小月河里的房

客，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找不到工作，就住在这里，拿家里的钱“虚度光阴”。

时间对于郑章军来说，却无比珍贵。他要实现自己的目标，除了不懈地努力，还需要时间。

五 进京记

张 冉

洪建修，男，1983年生，内蒙古牙克石人。原名洪健修，“修”从辈分，“健”取健康之意；登记户口簿时漏写了单立人，遂成“建修”，常因此被误认为搞建筑的。东北林业大学全日制本科毕业，通信工程专业，本科四年级曾在哈尔滨新东方软件班学习。2006年7月毕业后来到北京，现供职于一家软件测试公司。

大学毕业快三年了，洪建修攒了六万块钱。他独自住在北京西北角一个偏僻的村子里，每天朝八晚六的上下班。没有女朋友，家中父母还不需要照料。存钱做什么？

买房。

可区区六万块，顶多买个北京的卫生间——能买着也行啊，人家还不单卖。父母说，给你拿首付，你买房吧！

他眼一瞪：“首付？你当这是咱家？”家里十几万，足够买个房子。北京城要想买个房子，光首付就要几十万。

就算凑上了首付吧，房贷每月要两三千。洪建修付不起。

等有了女朋友，肯定不住这三百五一个月的村屋，可是往哪里搬呢？

还不知道。

总得要涨了工资再搬。可是看起来不跳槽就很难涨工资，往哪里跳呢？也不知道。

想出去玩，但没时间没钱；想学英语，但基础实在差。看看书上上网打打游戏，这日子也就过去了。

上班，工作没面子；生活，平时吃泡面；做梦，可总是记不住。若是有些，可，暂时过得还好。

那就先这样过吧。

1. 又干又热的北京城

2006年7月，23岁的洪建修正式告别大学生活，坐火车进京找工作。

背个大书包，揣一张余额1200元的银行卡，同几个朋友一块儿，坐了9个小时硬座，洪建修到了北京站。

他觉得这里又干又热。喧闹的人群更让烦躁升级。

“我都受不了了！”内蒙古人，东北林业大学毕业生洪建修说。他熟悉的地方，没有这么多人，也绝不会这么热。

这里是北京。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到京时已是深夜，朋友的朋友到车站接人，把他们领到知春路去找临时住处。

他们找到一间地下室，屋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别无他物。过道很窄，一个人走也要侧身。这个房间一宿40块。“真黑啊”，两年半以后，洪建修还记忆犹新。

没法不“犹新”。那个晚上，他一宿都没睡。可能火车上吃得不对劲，他整晚都在拉肚子，不停地往公共厕所跑，耳边还不时有蚊子嗡嗡地叫唤——脑袋都大了。

这是洪建修的北京第一夜，在繁华的北京城地下，他和一个男人挤在

一张双人床上等待天明。

不过，地下室也有一样好处——“凉快”。

2. 初到唐家岭——“北京也有这样的地方！”

那位朋友的朋友已经替他租好了房。房子就在唐家岭。

一宿没怎么睡的洪建修，在人群中疲惫地挤来挤去。他一大早被领上城铁，往北坐了两站，在西二旗下车换乘公交，到目的地时，已是中午。

到站下车，他清醒了：“那哪里是北京啊，真是脏乱差！”

他看到狭小的街道上，车辆来回穿梭，裹起一团团的尘土，笼罩着一旁各种各样的小店，有的店招牌已经挂了很久，来一阵风便摇摇欲坠。租房的小广告贴满了电线杆和目力所及的墙壁；抬起头，还是大大的广告牌，写着“招租”二字。没走几步路，不知从哪儿飘来的一个白色塑料袋缠在了脚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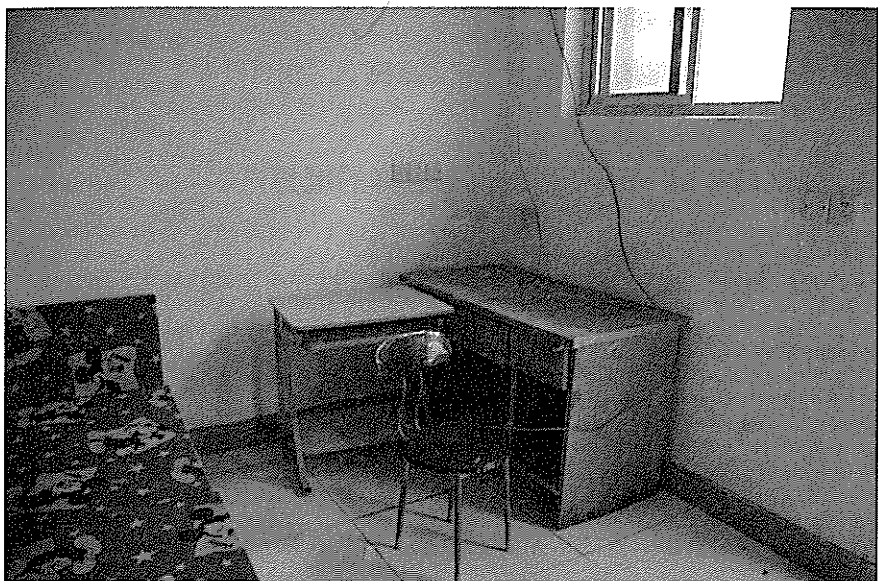
跟着别人在蜿蜒的小巷子里绕了五分钟，来到他未来的屋子里，洪建修一下就愣住了——房里只有一张硬板床。空荡荡的屋子里，什么别的摆设都没有。这样的一间房，二百八十块一个月，他和一个同来北京的朋友合租。

洪建修买了一床薄被子，拿了随身带着的几本计算机专业书当枕头，就在这硬板床上，睡了一个月。

屋里没有卫生间，他每天都不得不去一个公共厕所——“熏死人不偿命”，洪建修说，在里面待五分钟再出来呼吸新鲜空气，就知道什么叫做幸福。“没想到北京，也有这么垃圾的地方。”

北京的夏天热，他怕热。三十多度的气温，他花四十块买了个电风扇，“呼呼呼”吹出的都是热风。怕走电字，他给电扇定了时，每晚只开一小时。

可洗澡是个难题。楼里没法洗，外面的浴室又远又贵——要四块钱一次。他平时就随便拿凉水冲冲，直到房东在卫生间弄了个公共浴室，才能



2009年3月7日。唐家岭。桌、椅、床，网线，有时还有一个大柜子，这是“聚居村”的通用陈设。刘宇翔摄。

“凑合着洗洗”。洪建修每天都要洗澡，怕出汗，洗完了就躺在床上不动，可还是热得睡不着觉。

最可气的是他的同屋，每天倒头就睡，还爱打呼噜。烦啊，洪建修“直想踹他”。

可哪能真踹，白天还要和他一起出去找工作。

3. 投了四百份简历，他找到了工作

大四辛苦一年，他在哈尔滨没找到下家；老爹老妈没本事，也没法帮他安排。眼见同寝的七个哥们，六个靠家里帮忙找到了工作。洪建修一咬牙，“进京赶考”！

七月的北京，到处都是招聘会。洪建修每天七点多起床，简单吃些油

条包子，跟朋友一块出门。九点左右到会场，走走看看投简历，买两个煎饼果子当午饭，下午再回唐家岭。回到屋里只想上床睡觉，一睁眼又是大同小异的新一天。

同来北京的哥们，最快的一个三天就找到了工作，请他们在唐家岭相当体面的一家餐馆“庆祝”。四个人围坐一桌，一人一瓶燕京啤酒。

洪建修想，这是个好的开始。

可渐渐地，大家都找到工作了，只剩下他。

远在内蒙古的家人，也让洪建修很烦，爸总是说，找不着就回去吧。洪建修每次都是嘴上答应，“家是个小城镇，回去干啥呢”？再说，回去的话就错过了最好的时间，那时北京的招聘机会最多。

“如果我没坚持住，回去了，现在你还能在北京看见我吗？在家里待着，时间长了，心气会变，学的东西也就忘了。”他说。

每天从招聘会回来，洪建修还要去网吧，找招聘信息，投简历。那个网吧离住处两分钟，里面烟雾缭绕，还混杂着分辨不出来源的汗臭味。

整整一个月，洪建修至少投了四百份简历，全都石沉大海。

他一心想找软件研发方面的工作，但最后，一个做软件测试的公司挑中了他。过程出奇地顺利——周四投简历，周五面试，周一体检，周二就去上班了。

面试过后，洪建修觉得“可能黄了”，因为面试官与他的对话是这样的——“带毕业证了？”“没带。”“带学生证了？”“没带。”“那来干吗？”“找工作啊。”

但紧接着，洪建修收到了体检通知。

工资两千块，比他期望的还多五百。他很高兴。“很多高中同学，刚上班的时候工资只有一千二、一千五。”

不过他也没忘记，大学里那些学采矿专业的同学，大四时每天在床上躺着，都有人找他们签约。他们还都特拽，不去。

4. 搬家，再搬家——反正“都是豆腐渣”

找到了工作，洪建修决定搬家。他找了一个单间，带独立的卫生间，三百五一个月。两年后，他又搬到了更偏远的土井村。

他早就想从唐家岭搬走，原来的房子太破了！那里又小又贵灰又大，冬天冷，夏天潮。上班挤不上车，还堵得要死。

土井村是982路公交车的终点站，洪建修工作单位在软件园广场，982路直达，即便在早高峰，二十分钟也足够了。

房子是同事介绍的，同样是每月三百五的房租，条件好多了。二十多平方米的屋子，自带一个小间，夏天很凉快，洪建修准备到时就搬到里面睡。

屋内很空，电脑桌占据了一个小角落。台式电脑是2008年新买的，配了24寸的液晶显示屏，专门用来看电影。他今年还新买了手机和手表，原来的手机用了三年零八个月，电池不好使，按键也不灵光了；手表戴了很久，指针已经转不动了。

这三样东西，一共花了八千元，是洪建修在北京两年多来最大的花销。他平时很少买衣服。现在身上穿的白色条纹衬衫，还是人家搞活动送的。

正对着电脑桌的另一个角落，是一个一米多高的橱柜。隔层里放了些东西，最显眼的是一个落满灰尘的白色塑料袋，里面装着书。“全是以前学软件研发时候的书，很久都没翻过了，全是灰，还是别碰了。”他说。

橱柜的旁边，是乳白色的暖气片。上面画着一幅夏日风情图——绿色的荷叶，粉色的荷花半开未开，浮在水面上。可用手一摸，却冰凉——原来屋里并没有供暖。难怪在屋里人会不时地发抖。正常来讲，这时应该有暖气，但房东说：“天气暖和就不开啦。”

靠窗口有一张双人床。白色的床单和被套，都是大学时用的，一直用到现在。

墙上有几道裂缝。无论是土井村，还是唐家岭，都在不停地拆房子，盖房子。两层拆了盖四层。“成本用不了一年就能收回来，全是豆腐渣工



2009年3月14日，土井村。暖气片上面画着一幅夏日风情图——可用手一摸，却冰凉。梁旭摄。

程，”洪建修说，“盖房子用的都是旧砖块，水泥也很差，和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里面。”

不知道什么时候，洪建修还会搬家。周围的人都是这样，谁也不知道明天住在旁边的是什么人，当然也不确定明天一早自己会在同样的地方醒来。

洪建修的工作却出奇地稳定。他一直没换过工作。

5. 三十岁的时候，我在做什么？

洪建修加过一次薪，每月多了一千块。可是就只涨了这一次。

他一直都很节省，从不乱花钱，除了每月吃饭、抽烟、房租、水、电、上网费，加起来还不到一千五，六万块就是这么攒起来的。

可原来的同学不停地跳槽，工资涨了好多。洪建修“天天都想跳槽”，但是同类公司待遇都差不多，除非到外企。外企对英语要求很高，

偏偏洪建修是学俄语的。现在俄语都忘光了，英语还没学会。

“我们是被国家毁灭的一代。”他说。

他最大的担心就是钱。觉得俗吗？社会就这么现实。他有个学土木工程的同学，过年的时候抱怨说，老板真抠，年终奖只发了一万五。洪建修不说话，心里埋怨朋友炫耀——自己的年终奖，最多的那次才五千块。

也许要换行才行。洪建修很难想象，自己到了三十岁的时候，还在做个小小的软件测试员。

现在，他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不到八点出门，八点半上班，五点半下班，六点到家。午餐在单位吃自助，有肉有菜有水果，每人一个大盘子，他每次都装得满满的：“到了晚上也不会觉得很饿。”晚上煮两包泡面，或者在外面的小餐馆里吃个盖饭。吃完饭大概七点多。

其余的时间，他就上网打游戏，要不就看看网上新闻的评论——他觉得网友都很有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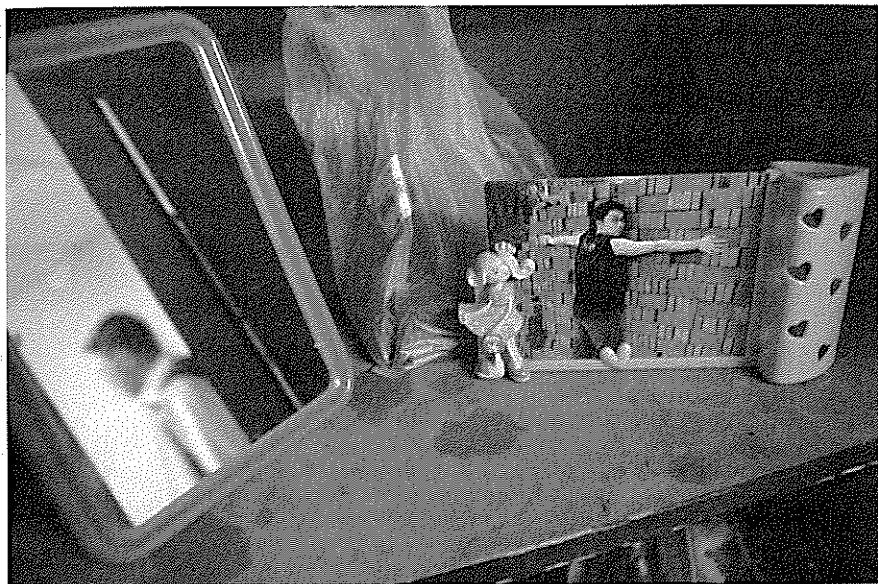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来北京两年多，洪建修仍然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他所熟悉的地方，也就是单位和他所住的村庄。

他知道坐什么车上班，坐什么车下班；知道每月什么时间房东会来收钱；知道出门走几分钟能走到吃晚饭的小吃铺——此外，还知道一点当地的社会学。

和唐家岭一样，土井村每月都会在村口收一人十元的“水费”。收费的人，都“挺横的”。住在隔壁的同事，去年年底有朋友借住。第二天一早刚好赶上收钱。那哥们不想给，双方吵起来，还动了手。后来来了两个警察，同事朋友的女朋友就说，打架警察不管啊？警察说，管啊管啊，就把不想交钱的人给带走了。据说在拘留所里住到现在。

洪建修听同事讲了此事。还好不是自己朋友，就算是也没办法，没钱没人，啥招没有，唉。“这就是社会。”他说。



2009年3月14日，土井村。毕业照上，他一脸严肃，拥抱着一堆红色的砖。梁旭摄。

这时候，洪建修的眼睛望着橱柜里的一个红色相框。照片是毕业时寝室的哥儿们帮他拍的。画面上，他张开双臂抱在一堵长长的砖墙上，转过头对着镜头，脸贴在红色的砖块上，一脸严肃。

“那时候头发跟乱草似的。”他说，脸上天真地浮起一丝微笑。

六 保险公司的羚羊

张 冉

李鑫平，男，1984年生，山西柳林人。自考生，2004—200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习，会计专业。现在一家保险公司做推销员。

1. 单位——狮与羚的故事

2008年5月，已经完成全部自考科目的李鑫平，找到了某保险推销员的工作，开始了在写字楼上班的时光。

他上班地点在西直门外的某金融大厦。西直门是北京重要的交通枢纽，这里，公交、地铁、立交桥是人流车流的生产线，即使没到上下班高峰时段，车流人流也是簇拥着前行。从西直门城铁站下车，过一个天桥，就是该金融大厦了。

这里的写字楼和中关村的相比，密度小了很多，楼层也不是那么高——该金融大厦总共11层，在这里，算是高层了。

保险公司的办公区占据了整栋大楼。第一层，八个展板挨着墙排开，上榜业务员的肖像照挂在展板上，他们个个身着正装，精神抖擞——成为上面的“名人”，是李鑫平的目标。

他的办公室在七层。走出电梯，迎面就能看见一张大大的海报，占据了差不多整个墙面，海报上说的是狮与羚的故事——“在非洲，瞪羚每天早上醒来时，他知道自己必须跑得比最快的狮子还要快，否则就会被吃掉。狮子每天早上醒来时，他知道自己必须追上跑得最快的羚羊，否则就会被饿死。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瞪羚，当太阳升起时，你最好开始奔跑。”

无论是谁，看见海报的时候，总不免被狮子和瞪羚的眼神震慑住。每天早上李鑫平登上电梯，走进办公室，脑海里始终萦绕着“奔跑”二字。

办公室是一个一个的格间，空间很局促，耳边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坐在办公椅上，视线被隔板拦住，但仍能依稀感觉到黑色的影子在不停地走动。尽管声音嘈杂，却有一种方正严密的秩序把人吸进去，“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放松”，像被关到牢笼里一样。

整个楼层，都被各式各样的海报、宣传画、红色的榜单、照片、汉字标写的数字包围着。“每个人每个月挣多少钱，各个部门前十名，全都在那里贴着，”李鑫平说，“一切都在做比较，比较业绩比较穿着比较工资比较以



2009年3月11日。你最好开始奔跑。刘宇翔摄。

后的发展……”无形的压力，就藏在墙上的面孔与人民币的数额之后。

下午五点四十，正是下班的时间。电梯从高往下每停一层，都有很多人走进来。他们西装革履，白衬衫、黑色西服和西裤。每个人都有一双警觉的眼睛，写着迟疑和不相信。

2. 寒风中的等待

下班了，走到西直门，运通205载着他到唐家岭，这个他住了将近两年的地方。

工作辛苦一天，回家的时候应当开心，对于李鑫平来说，却不是这样，下班只是又一个劳碌的开始——舟车劳顿，每天都要至少一个半小时，他才能到家。遇到中关村大街堵车，就要两个多小时。八九点，平常人家早已收拾好碗筷的时候，他才开始吃晚饭。

他忘不了2007年的冬天，下午五点半保险公司培训结束后，在寒风凛冽里等了整整一个半小时，车才来。这一个半小时，他缩着头，在车站来回踱步，实在耐不住了，打电话给公交公司投诉。然而，他还得继续在车站等着，因为公交公司不能控制在马路上行驶的车以及糟糕的交通。

天越来越黑，风也刮得更猛烈了，好不容易看到亮着车灯的运通205开过，眼前就黑了——黑压压的人群把一米六出头的他挤在中间，到处都是人，推着他上了车。从车窗往外看，星星点点的路灯之下，还是黑压压一片的人，“再来两辆车，恐怕都装不下”。

在回家的公交上，总有这样的时刻：他浑身酸软地瘫坐在椅子上，收敛了推销保险的职业微笑，轻轻地感叹一声：“在这样的大城市里，生活的确很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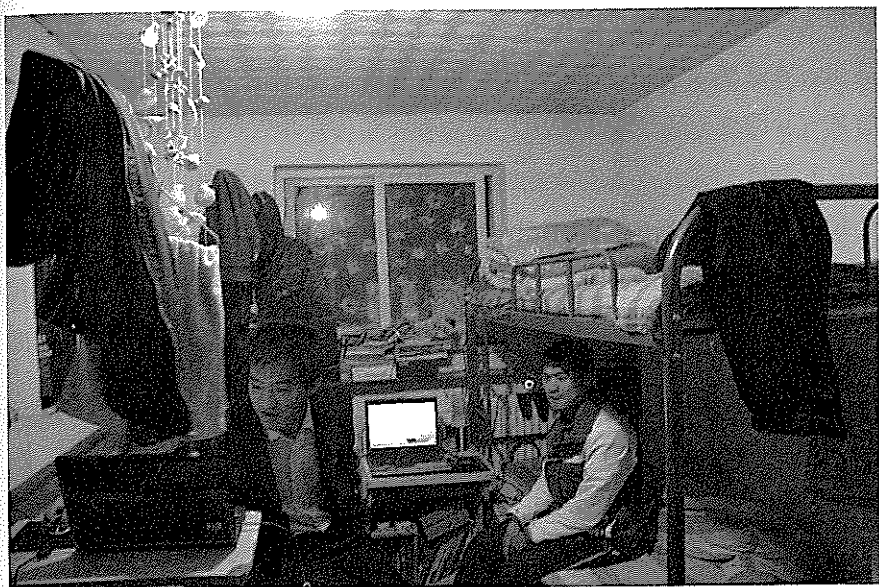
3. 灰尘与砖块

到了唐家岭，车停了足足两分钟，伴着嘟嘟的刷卡声和或轻或重的脚步声，大半车的人走下来或者跳下来——他们到家了。

走下公交车，路面上的扬尘扑面而来。隔在车道中间的砖墙，让本来就不宽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四处车灯闪烁，人的眼睛就在光与灰的影子中扑闪着，害怕耀眼的车灯，害怕钻到眼睛里的沙尘。

西直门和唐家岭，这两端都是密密麻麻的人群，不同的是，一头是窗明几净，另一头则是灰尘密布。

选择在唐家岭住，一来朋友的推荐，二来“这里吃的比较多”，爱吃的李鑫平便忽略了灰尘，在这里安了家。一天的辛劳之后，美美地吃上一顿，是李鑫平最好的享受。唐家岭或许缺少整洁的环境、井然的秩序，但最不缺的就是街边一个一个的小饭馆。东北菜、川菜、湘菜、麻辣烫，凡是能想到的吃的，这里都有。每天晚上六点开始，路灯初上，生意也渐渐火起来。



2009年3月11日。唐家岭。局促的小屋里住了三个人。刘宇翔摄。

晚饭后已经八点多了，弯弯曲曲的小路引向他要安睡一晚的地方。忽闪忽闪的路灯，没有持久的明亮与安全感。走到了一个小巷子里，到处都可以看见堆砌的砖块，这里永远都在拆与建的循环之中。那一堆堆的砖块，可能消失在今天，又会在明天的另一个地方出现。

上楼的木梯摇摇晃晃，若是第一次来，会很害怕从上面掉下来。而李鑫平早已经习惯了，闭着眼睛都能走，根本不用小心翼翼扶着旁边的栏杆。

在这个房东自己搭建的二层楼里，没有公共厕所，也没有洗澡的地方。冬天要上厕所，得出去受冻，于是，他“憋着”；夏天，公共厕所缺水冲刷，臭气熏天，于是，他“忍着”。

公共厕所所在小巷的进口处，一堵砖墙，可以看见漏风的没有装玻璃的窗户。到了晚上，厕所没有亮灯，黑乎乎的一团，什么都看不见。但即使是新住户也很容易找到它，那股刺鼻的味道，却是无论如何都去除不掉。

他的小屋里，一个上下铺，一张单人床。他熟练地把电脑拿出来，放

在单人床上架着的小桌上。上下铺是两弟兄睡的。弟弟是一个1987年的小男生，在这里上学。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外套，像一件中学的校服，脸上带着稚气，两颊上还泛着红晕。

从五点半到九点，李鑫平经历了由白日的辛苦到黑夜的安静，由喧嚣的闹市到尘土飞扬的村里栖息的过程。这一路上，西直门中关村清华北大，繁华的经济中心，中国最聪明的智力资源聚集在这里。只是海淀学府里的知识精英们，怎知在半个小时的路程之内，就是“村”的光景？

4. 压力大，也要尽心

保险公司每个月都有任务指标，达不到的员工要降级。很多人都没有熬完前三个月，就从公司“跑了”，因此这个行业有90%的流失率。

李鑫平坚持了下来。试用业务员、正式业务员、业务主任、业务经理一级、业务经理二级、高级经理一级、高级经理二级、区域总监、区域副总经理、区域总经理，这一级一级的阶梯让他艰苦奋斗。从试用业务员，到正式业务员，再到业务主任，他用了整整九个月。有比他快的，半年就升到业务经理一级；也有慢的，一年多，还只是试用业务员，每月拿1500元的底薪过活。

每天必上的课程，是八点半开始到十点半的大早会。所有的业务员聚集在大厅里。他们交流业务，分享经验。之后是四十分钟各个部门的培训。这样一个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

在早会里，李鑫平总能学到东西——如何与人沟通打交道，了解经济走势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他给自己制定目标，对之前的工作进行总结。他期盼着每天的进步。

下午，是业务时间。刚来保险公司的时候，他每天打电话推销。一百块钱买一万个全球通的电话号码。“那时候可苦了”，一天四五百个电话，小灵通从来没有停过，挂了电话就拨下一个手机号，“打到后来都发

热”，每天晚上充满电的小灵通到了下午三点钟就没电了。

公司每天都有一个小榜，每个人每天做了什么都挂在上面，达到标准才能回家。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看到别人的工作量，脑海中又浮起墙上的海报，业绩排行，一层的名人墙，李鑫平总会感到压力。

每天都有工作量，若完成了工作量，五点半可以下班，完不成就走不了。为了完成业务量，前三个月，他每天八点才能从公司出发回家。现在就不需要了。坐在公交车上，李鑫平说：“我们部门里面现在还有好多人没下班呢。”

他打算在保险公司干三年，尽管以后一定会离开，但是他说，也要“像经营自己的事业一样尽心”。

这三年，他要学到销售的整个流程。在保险公司，每天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会学到“见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怎么把客户搞定。

他说，做什么事情都不容易，但是既然做了，就要踏踏实实，有所收获。

5. “你永远都不知道电话另一端的，是什么人”

现在他已经不需要自己亲自打电话来推销了，作为业务主任，他有两个助理专门打电话。他要做的，就是和有意向的客户进行深一步的交流，为他们制作合适的保险计划，会见客户，出单签保险合同。

和客户的谈判在他看来，是充满未知的，是刺激有趣的，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电话另一端的，是什么人”。他有可能是农民，也有可能是央行的行长。

至于能不能谈成，要看相互的感觉。“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你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你。遇上不喜欢的客户，看了第一眼他就知道，没戏。

有一次他去西单的中行总行，客户是四十多岁的白领，拿了她那张名片，走出去都不一样。“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很好。真的，有些有钱人，素

质就是很高。”可惜这单他没有谈成，因为第二次再见面的时候，他以要签单的心态去，被理性的银行人看出他的着急，于是黄了。

李鑫平还谈过一个特别有钱的客户，开的是宝马，有三套房产。后来没有谈成，客户说，做个三千块钱的吧，看你们整天在外面跑啊，也挺辛苦的。李鑫平说，当时他的脸刷一下就拉下了，很不高兴。“我的工作虽然很辛苦，也希望你能买我的保险，但我不愿意因为被可怜才做出业绩。”他认识一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十二岁死了妈妈，十七岁出来闯荡，从学徒到现在的大厨，“都是一步一步努力奋斗过来的，不需要被别人可怜”。

他有个同事，和一个北京的暴发户谈。暴发户特别喜欢拍桌子，后来同事也把西服一脱，跟着拍桌子。这样，单子才顺利地签成。

6. 铁哥儿们

客户是陌生的，但是那些从小处来的哥儿们，让李鑫平觉得，总有坚实的靠山，让他觉得安心、快乐。

2007年过年回家，早上五点还没到，天还没有亮，就有哥儿们开着车到车站接他吃饭了。本来和家里人说好20号左右回家，却在哥儿们那儿呆到25号。真回家时，又是一大帮人跟着他回去。只要是在哥儿们的地盘，他住宾馆，吃香的喝辣的，从来都不需要自己花钱。

他的高中同学，家里都比較有钱。有困难的时候，李鑫平不愿意向家里人开口，一个电话直接打到哥儿们那里，只要说“在几号几点之前，把多少钱打到账上”，他的燃眉之急就能解决。就算那时他们手上没钱，借了钱也会打到李鑫平的账上。

但即便哥儿们比他有钱，关系铁，他借了钱之后总是要还上。

哥儿们来北京，他也尽了地主之谊——五个人来玩，他花了六千，“啥都买，啥都吃，北京能玩的地方都玩了”。当时是2005年，李鑫平还没有正式的工作，在外面做兼职，一个月最多就挣一千块钱。这么十几天

的工夫，他半年的积蓄都花出去了。

今年过年的时候回去，李鑫平发现那帮朋友们变化很大。

以前都是在一起讨论吃的玩的，现在问的都是有什么打算，想要干什么。他们抽的香烟也不一样，原来是十块钱的芙蓉红，现在都是中华。而他，现在每天的花费，或许还抵不上一包中华。

七 孤独的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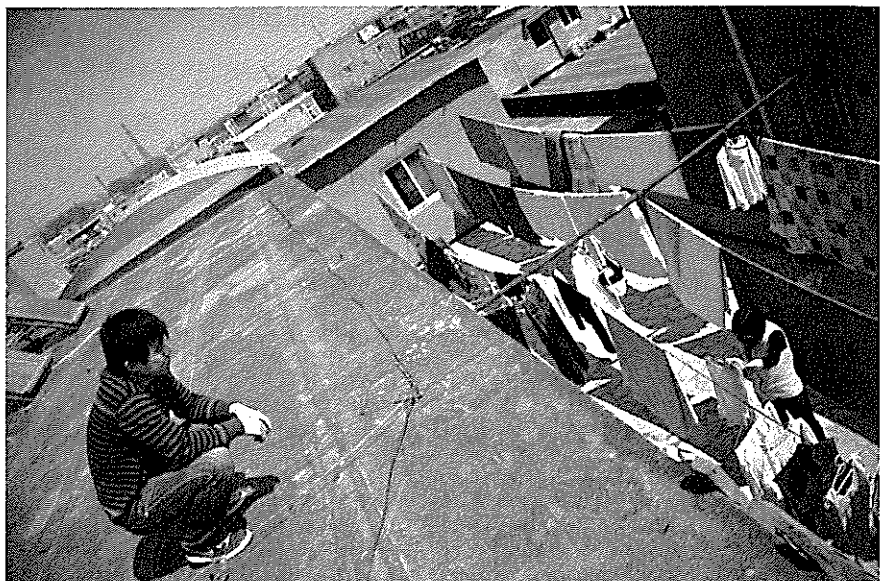
梁 旭

柳辰完，男，1984年2月出生在辽宁省大石桥市，家里是做买卖的。2007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计算机专业。现居住在小月河学生公寓。他说他有点自闭，有点忧郁，坎坷的人生经历，让年仅二十五岁的他看起来比同龄人要成熟许多，世事的历练，抓不住的美好回忆，让他比同龄人更懂得珍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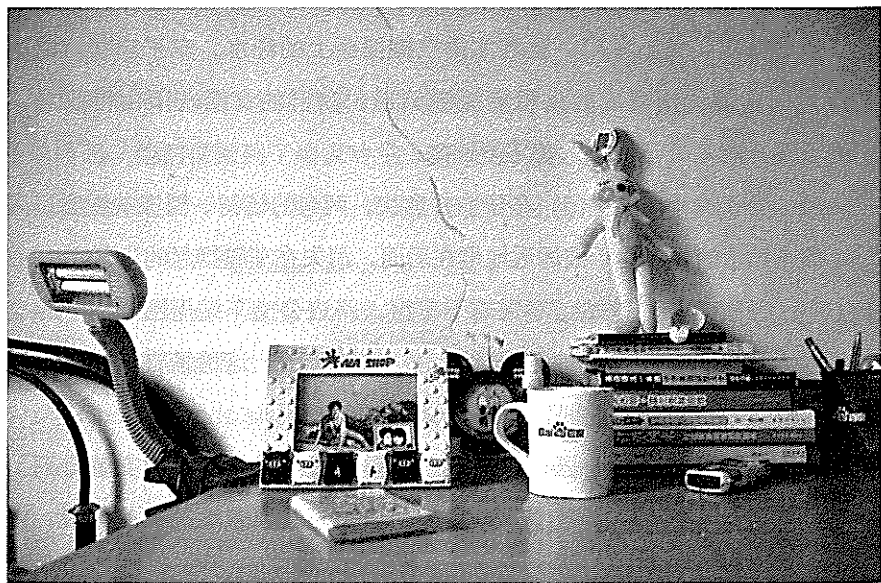
珍 惜

发表于2008年9月22日01:42。

珍惜这个字眼很多人都明白，可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人这辈子很忙碌，有很多东西都忽略了，等到有一天回想起来的时候留给自己的只是遗憾；有好多人到生命最后一秒的时候，他脑子里面还留有一个遗憾，临死的时候还是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间，没有让生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要学会珍惜，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我知道我想要得到什么，我失去的东西我要用双倍的付出追回来，然后挂在胸前，那里离我的心最近，我要用我一生的爱去呵护。每个人都经历过爱情，每个人也



2009年3月28日，就要离开唐家岭，狄群第一次爬上房顶，俯瞰这个陪伴了他两年的村庄。这里一天一个样子，去年，他脚下的房子还不存在，这里只是一个幼儿园。梁旭摄。



新居的写字台上，摆放着狄群的相框。百度的杯子和笔筒是狄群曾经的工作记忆。梁旭摄。

衣机，还有随时可以洗热水澡的浴室，这些都是他们在唐家岭想都不敢想的。

收拾好属于他们的房间，邓锬坐在床上，狄群一屁股跌进沙发，闭上眼睛享受着期待已久的舒心。他伸出左臂，大手一挥：“终于离开唐家岭了！”

九 向下的青春——“高知”贫民村调查

何忠洲

在北京，这个在社会学上被命名为“新失业群体”，开始越来越庞大，并且在北京的周边地区，逐渐形成一个个群落。

太阳一往西移，唐家岭就开始拥挤不堪。保持着几分钟一趟的速度，一辆辆公交车，犹如卸货一般，将满车厢的乘客吐了出来。本来就只够两辆车并行的街道上，瞬间便全是人。路边的摊贩开始起劲地叫卖在浑浊的空气里已经无法分辨出味道的熟食来。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最靠边的一个村子，隶属西北旺镇，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再往西一点，就是昌平区的地界。

不过李竟没有上班，下午五点半，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离站台不远的的一个熟食棚里，埋头狼吞着一碗牛肉面。从早上吃了一个烙饼到现在，他连午饭还都没吃。

此时，和他住在一起的黄玉清还没有下班，一墙之隔的罗平与胡小杰刚刚在中关村挤上公交车，一个小时后将到达唐家岭。

这是李竟一天中差不多最舒服的时候，夏日的溽热即将退去，而吃饱

了肚子，已经在屋里窝了半天的他，浑身的劲儿就都来了。

“吃饱了，一天的窝囊劲儿就都散掉了。”他说。

1. 落脚唐家岭

李竟在屋里已经窝了快两个月了。在离唐家岭车站站台大概三四百米的距离，一溜铁皮架子搭建的平房，靠边的一间，李竟就住在那里。

就在这个被李竟强调是“住处”而不是“家”的地方，他已经住了整整一年。这也是李竟大学毕业后一直呆着的地方。

一年前的7月1日，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卷着4年前入学时学校发的一床被褥，一个脸盆，一个揉巴着几件衣服的皮箱，几捆舍不得丢的书，李竟来到这里。

年纪轻轻的他，提起往事，已有不堪回首的唏嘘。

今年24岁的李竟来自河南安阳农村，2002年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尽管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19%，但是对李竟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根据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卫宏当时对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科技大学等院校的实证研究，全国平均城市万人录取数是农村的4.25倍，城市享有的高等教育机会远远高于农村，差距极为明显。

4年大学生活，李竟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过着“三点一线”（课堂—宿舍—食堂）的生活。

和高中时对大学的想象很不一样，等到李竟上大学时，有关大学生跌落凡尘的故事已遍布于社会。从杀猪卖肉，到买冰糖葫芦、烤羊肉串，“天之骄子”的光环已经不再惠顾这一群体了。

2006年5月，教育部高校学生司负责人说，大学生定位为普通劳动者。

李竟回忆说：“当时学校里议论纷纷，我从报纸上看到印象最深的一句话，说现在的大学教育：收费精英化，就业大众化。”

这已经是大学生就业难在中国上演了若干个年头之后的事了。

自从1998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到2002年左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就一年胜过一年。

根据2006年12月份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7年，中国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口将超过2500万人，而新增加的就业岗位加上自然减员一共只有1000万个。而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全国11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调查表明，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仅占新增就业岗位总量的22%，但在2007年，有495万大学毕业生等待就业。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

紧箍咒是从一入学就带在每个同学的头上的。

李竟说，我原本是满怀理想、壮志凌云的，以为上了大学就可以如何如何了。但是入学第一天，一位师兄就告诉我们，好好学习，希望将来能找个好工作。

不过，这些并没有太影响李竟，甚至在2006年开学不久，学校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还曾经专门组织过一次关于大学生就业的讲座，一个专家在台上讲：“好工作就业单位不要人，赖工作大学生不愿意去。”他说，大学生就业，应该放低眼光，着眼长远。

李竟当时甚至觉得好笑，因为那个时候，他参加了研究生考试，正在等考试结果。“我当时就想，我都考研了，着眼还不远吗？”

就在这个时候，团中央、教育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又组织大学生到西部去。任期结束，他们能够享受考研加分等优惠政策。

同年2月，北京市首批招聘200名大学毕业生，到郊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和村委会主任助理。

这些，李竟正忙于考研准备，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但是，到2006年4月，考研未成功的消息突然使得李竟变得极为被动。他突然发现找工作是一件如此令人难堪的事情。那两三个月里，尽管每天早起晚归，在中华英才网的求职栏里，他也不知发过多少电子邮件（“反正每

次都很简单，复制粘贴，然后发送。”他说。），面试次数连自己也数不清，但真正有意向签约的却屈指可数。曾经有一家公司，答应了和李竟签，但是李竟稍微犹豫了一下，因为他觉得也许还会有更好的机会。但等到他决定去签的时候，那家公司却因为约定的时间里他未到而另招了他人。

按照规定，到7月1日，毕业生都要离开宿舍。之前，离别时刻的发泄都已尽兴：拼酒、摔酒瓶、酒醉痛哭，散伙饭也已经吃过，离校成为必然，而找一个住处则成为了当务之急。

在唐家岭一带找地方住就成了必然的选择。“我当时还想再考一年研的，那里离农大不太远，以前黄玉清在那边住过。”黄玉清并不是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的学生。他和李竟来自同一个地区。在民办高校中国软件学院读书期间，他有一段时间在外面租房子住，就在唐家岭一带。那时，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是150元，很多年轻人都还住在东北旺，那里离中关村更近。上地软件园那时也还没有完全建成。但是，两年之后，同样的房子已经涨到300元。

卷着铺盖的李竟在黄玉清的带领下，在唐家岭住了下来。

2. 群落正在形成

罗平与胡小杰也是大学生。不过一个是大专生，一个是来自某所并不出名的民办学校。他们比李竟还要早住进这一溜儿平房。四人均来自农家。在李竟住进不久后，只有一墙之隔的他们就混熟了。“有时候有事情我们懒得敲门，就直接捶墙。”胡小杰说。

相比于黄玉清、罗平、胡小杰等人，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李竟还是显得有些特殊。“毕竟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说出去好听一些。”

但是很快，李竟便不愿意在人面前提及自己毕业的学校了。李竟开始打算边找个临时工作干着，边利用空闲时间准备考研。“毕竟考过一年了，不需要一开始就专门来准备。”于是，在黄玉清的介绍下，他到中关

村找到了一份卖电脑的临时工作。底薪800元，按销售利润提成15%。但是一个月后，李竟颗粒无收，竟然连一台电脑也未卖出。“还是太面，见到生人张不开口，更重要的是他不会和别人去抢生意。”同在一起卖电脑的黄玉清说。

就在卖电脑期间，李竟又认识了在海龙电子城站柜台的程娟，不过，她并不是大学生，她高中毕业后就跟着叔叔出来了。

当时他们正找房子，李竟热心地告诉他们唐家岭的情况。于是他们搬到了唐家岭。在那里，出租求租的牌子与纸条到处都是。而程娟在找合租伙伴时，碰到了女孩“素素”。

再加上原本住在这一溜铁皮房子的一些人很快都混熟，这个圈子在唐家岭越来越大。

记者询问到底有多少熟人在这附近，李竟想了想说：“都是年轻人，不下四十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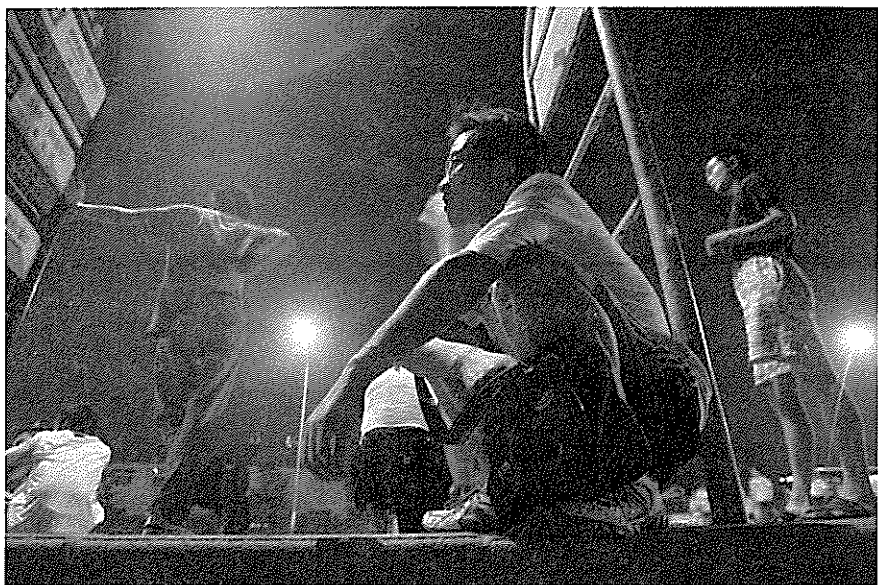
这是唐家岭四五万外来人口中的几个。而本村村民，才三千多，正是这些外来人口，成就了每天上下班时唐家岭街道黑压压一片的局面。他们，基本都是年轻人，每个人都在唐家岭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和交往圈。

而大学生，成为了这个群体里面比重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人。

不过，李竟并没有和他熟悉的这近四十人很频繁地来往。下班后，更多的时候，他窝在屋子里看书，这使得他与众不同。而更多的年轻人，则到街道上四处逛。那里，音响和叫卖声混成一片。

李竟经常与大家见面的地点是在唐家岭公交站的站台。即使是失业之后，窝在家里，“每天连午饭都懒得去吃”，李竟还是会在唐家岭的街道上出现。

隔三差五，他会碰到一些同病相怜者。罗平也曾失过业，在那段时间，懂一些技术的他做过一段时间的电脑修理工。这使得他接触到更多居住在唐家岭街道一线的年轻人。以后经常在街道上碰到了，大家就会招招手打个招呼。



因为工作需要，上班绝大多数的时间是站着，累了一天的雷杰在公交车没到站之前蹲着休息。刘震摄。

不过，电脑修理工，这仍然不过是个短工。在认识李竞的那些年轻朋友们中，绝大部分都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不乏车轮战般的换工作者。

导购、营业员、餐厅服务员、业务员，甚至散发广告传单，李竞还一度尝试找家教做。按照行情，每小时能够有30—50元的收入。他甚至曾经贴出条，表示愿意家教和家务一起做，但是最后没有人找上门来。

他所做的都是些临时性的活儿。这些临时性的活儿，在大家眼中，本来就不算是工作。

好在，每个月都有些收入，而且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梦想，大家也都相信，梦想总有实现的一天。

尽管在唐家岭，这里的生活环境算不上好。然而其优势也是明显的。首先，这里生活成本远较市内低。而遍布于这条街道的二元店、三元店里，很多生活日用品都可买到。就是吃食，譬如牛肉面，别的地方卖五

元，这里卖三元。

更重要的是，这里离中关村、上地软件园都在一个小时的车程范围内。从2006年，北京公交降价以后，拿着公交卡，只要花上四毛钱，他们就能够坐上一两个小时的车，到需要去的地方。虽然有时候也很费时间，但是对这群人来说，最不值钱的就是时间。更何况，就在北京的上班一族里，还有很多人得坐两个小时的车才能赶到工作地点，对于居住在唐家岭的人来说，他们实在是幸福多了。

3. 失业后的困顿

到了晚上七点半，罗平与胡小杰都回来了。记者约李竟等人一起吃夜宵。

在狭窄的唐家岭街道的两侧，一到晚上，长龙般的大排档就摆了出来。

为了招揽顾客，大排档的一面是电视，正放着东北二人转。一个光膀子的老头正和一个老妇女插科打诨。一大群人一边喝酒一边大笑。

就在坐下的时候，李竟斜了一眼，轻声简洁地说：“俗！”

不过，和着毛豆、花生，几杯啤酒下肚，李竟的话开始多起来了。

在唐家岭的日子并不让人快乐，总有来自外界的很多压力，“使人憋闷”。

自从毕业，李竟就没再回过中国农业大学。一次，同班同学聚会，李竟也兴冲冲地前去参加。分别数月，同学见面分外亲热。但是，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同学之间的差别就已经出现了。有如李竟般无业却正在准备考研的，也有很快就进入社会角色，在社会上颇有大展拳脚之势的。分别时，一位北京本地的同学开着轿车，“走，带你一程。”那个同学说。

“不，我自己转转就回去了。”李竟一口回绝。但是在回去的路上他心里却堵得慌。于是忍不住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电话是大姐接的。



湖南人谭淼毕业于武汉一所民办大学，来北京找工作一个多月了。他租住在—间容纳10人的屋子里。为了省钱他每天只吃—顿饭。刘震摄。

问了几句家里的情况，大姐便开始问他的状况。

“总不外乎我怎么样有没有钱用这些话，那时我就在唐家岭这边窝着，什么事情也没有干，但是我得告诉家里我很好，有事情正在干着。”李竟后来说。

电话随后转到邻居家小孩手里：李竟哥，我再过两个月就初中毕业了，想出来打工，你在北京这么多年，能不能帮我介绍—份工作啊？

李竟—下子愣住了，不过他马上接茬：“好，等到有合适的工作我给你打电话。”

无论怎样，在老家，他是大学生，家里的脸面是要顾着的。但是压力却始终在。经济压力是—个无法回避的现实。

在唐家岭住了三个月后，从来不会理财的李竟开始理起财来。他把自己的每—笔收入都—记在—个小本上。

抛开每个月和黄玉清平摊的300元房租和六七十元的水电费，个人的消耗实际上并不高。为了省钱，他们自己做饭吃，虽然是单间的房子，但是房东在出租房的一角摆置了一些厨具，再添加一些碗筷，自己做饭，每个月的生活消费都能控制在200元以下。这就意味着，不出什么意外，一个月400元，李竟就能安然度过了。

但前提是，他能够有点事情干。“而且，我没有办法做到那么节省。”他说。

夜宵后的结账很快成了一个注脚。原本是记者说明请客的，但是吃罢，当服务员拿着账本过来时，李竟竟然和记者抢着结账。四个人，喝了四瓶啤酒，吃了很多毛豆和花生，花了五十多元钱。

但是，刚刚走出大排档，一个女服务员追了出来：“喂，你们给钱了没有？”

李竟的脸一下子红到脖根。在收钱的服务员回应“付过了，付过了”的同时，他拔腿就走，就这样低着头，一直走了很久，他的话才又多起来。

夜晚的唐家岭备显热闹，大货车贴着人呼啸而过，烤羊肉串架子上烟火缭绕，音像店里摇滚四起，再加上尚未退尽的溽热，街道上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

李竟领着记者在人群里穿梭，嘴里开始不停地说话。在一个路口，他突然停住话头，头抬得高高的，径直往前走。那里，一家成人保健商店正虚掩着帘子。旁边是一个美发厅，穿着肚脐装的女郎高挑着腿在微笑。

4. 腹背受困的群体

对于李竟这样失业的人来说，最难过的倒并不在于生活的艰难和压力。“每个月有几百块钱的收入倒不是很难，吃的差些穿的差些也无所谓，周围污水遍地也能忍受，唯独面对前途，让人很难受。”

在搬到唐家岭后不久，李竟和黄玉清，胡小杰等人就曾讨论自己的命

运与出路。开始，考研是李竟的希望，但再次考研失利之后，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就算考上研究生又如何呢？很有可能也只是（失业）缓期执行。”

开始的时候，没有工作，李竟觉得是自己的机会没有把握好，因为考研失去了机会。毕竟，同学中间也还是有人找到工作的，甚至也有还不错的。他也曾自责：大学期间为什么就没有更多地到外面去接触呢？为什么没有多考个证呢？他甚至有过一段时间的绝望期。“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可能确实是我能力不行的原因。”

但是，当他在唐家岭住下来，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自己一样时，心底里的疑惑便与日俱增。他清楚地记得学者孙立平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使他的想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在那篇文章中，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分析说：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是大学毕业生挤在大城市、造成就业结构畸形的主要原因。

李竟曾有过回家乡所在县城找工作的想法，一个选项是去教书。但是，就在去年，他的一个表妹师范毕业，通过各种关系，花了一万多元，才进了镇里一个小学当老师。在那边，各种政府机构人浮于事，而企业，更是没有多少生机的。“我要是回去，可能根本就没人要。在北京念的书，好歹还认识一些同学和老师，在老家那边，我什么关系也没有。”

对孙立平提出的“新失业群体”，他很快就对号入座。“我们也是弱势群体，没有话语权。”他说。

但是，在北京又将如何呢？

跨过污水纵横的小道，李竟带记者到他居住的地方。在不到十平米的一间小屋里，上下层的铁架子床，两张木桌上放着洗漱用具，公共厕所的臭气从一边传了进来。

“你家里收拾得很干净啊！”记者说。这句话马上得到李竟的纠正：“住的地方，哪能称家呢？”

这又是一个在夜宵时曾经延续的话题，当时，记者问到：万一考研不

成，那你以后怎么考虑？

李竟回答说：“不知道，先就这样呆着吧。”

说罢，他猛喝一口酒，一时给呛着了，剧烈地咳嗽起来，竟把眼泪都咳了出来。

（转引自《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8期）

十 奋斗在“大学村落”

初春，柳色青青。

早上七点，三五成群的年轻人走在河堤边，步履匆忙，队伍颇为壮观。他们赶着奔向写字间或者是大学的教室，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揣着梦想奋斗在北京城。通向大路的河堤是他们每日的必经之路，见证了他们离开大学后在北京工作、学习的生活。

这里是他们的“大学村落”，位于北四环外、八达岭高速以西，二里庄。有着美丽名字的小月河是条时常有臭味的水沟，整夯的河堤西边是这些年轻人的落脚地。河边曾经发生过命案，学生们中流传着一对殉情男女不同版本的故事。

小月河主营学生公寓的物业公司有八家左右，每栋二三层的楼结构大同小异，与大学宿舍类似，一楼住男生、二楼以上住女生，顶层有自习教室。昏暗的通道两边是紧闭的房门，走进房间，二十平方米左右，墙壁斑驳，三张高低铺占据墙角，桌子、床头堆着一摞摞的司法考试辅导丛书、GRE词汇、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辅导书等。床底下、柜子顶上放着大小不一的箱子。地上堆放着塑料盆、垃圾桶等杂物。入住只需要登记身份证号，住宿长短按需而定，住的时间越长越便宜，半年1500元一个床位。由于流动性大，每年的9月要租到这样一个床位并不容易。

住在这里的年轻人都来自外地，没有北京户口，大多在北京各类中小企业或者小型外企驻京办事处工作，不工作的则是在准备法硕、注会等热门考试。人员流动频繁，有的住了三年，有的刚来一个月，“性价比高”是他们选择这里的一致理由。租费便宜，房间里有空调、电视，免交水费、电费，如果要接入网络再交80元/月，大部分人拒绝了网络。“这样才能更安心地学习，而且附近的网吧上网很便宜的。”只要一个电话，每份不超过五元的面条、盖饭直接送到房间。改善伙食的话，他们会到河边散布着各种口味的小饭馆，流行的烤翅、麻辣烫最受欢迎。沿河的地摊上小贩出售各种各样的东西，用他们的话说“应有尽有”。

在北京，他们拥有的很少，站着是两个脚印大小的地方，躺下是一张小小的床。然而他们每个人都乐观、积极，相互鼓励着，坚持着“高低铺”的日子，追寻心中的梦想。

城市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人的命运捉摸不定。“大学村落”的年轻人游离在城市和大学的边缘，在他们青春弥漫的气息背后，是无知无畏还是精打细算，并不能简单下定论。他们会笑着告诉你，王宝强曾经就住在附近的某个公寓，却不愿多说自己在寻觅着的东西，只谈现在正在做什么，比如备考、工作、跳槽……

1. 这里不缺成功传奇

张 樱

杨珊珊从湖南老家来北京参加人民大学的自考，两年学业结束拿到文凭找工作，她在北京一待就是四年。找工作的艰难她已经不愿多提。“想起来就特别憋屈，我明明已经完成了专升本的学习，拿到了人民大学的文凭，可是每次找工人家都会以相同的理由把我一棒子打回来：‘对不起，你读的不是全日制大学。’我的自信全没了。如果可以，我真想回到当时以自考生的身份坐在人民大

学课堂里和其他本科生一起上课的日子，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真正的本科生，特别自豪，觉得自己真了不起！”

杨珊珊算得上是小月河的“老人”了。近四年的“宿龄”，让她对这里的典故、传闻了如指掌，也让她见识了各种不同学历、不同生活背景、不同职业的室友。住在小月河，杨珊珊觉得最缺少的不是文凭，不是北京人的身份，而是“安全感”。

现在，杨珊珊在一家规模很小的私营企业工作，每月1200元的工资。在那家以北京本地人为主力军的公司里，杨珊珊是没有北京身份的少数派。刚参加工作的头半年，她曾经几次在电话里失声痛哭，告诉在湖南农村的父母自己想回湖南工作。“可是爸爸严厉责备我，希望我怎么着也得在北京坚持下去。他觉得我能来北京是光耀门楣的事情，在当地逢人就说。在他眼里，我在北京学习、工作就成了北京人。”

和杨珊珊的父母一样，不少“小月河族”的父母们在家乡对孩子在北京学习、工作的现状不太了解，认为他们来到北京、找到工作就是奋斗的最高目标，至于其他，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待在北京。杨珊珊们已经回不去了。

工资不高，杨珊珊只能选择住在“大学村落”。

小月河的出租方式有两种：租床位和包间。租床位前你对其他室友一无所知，不知道会遇到什么背景、什么生活习惯的人；相对来说，租包间的自主选择性更强，你可以找三五个熟悉的同性好友，一起去物业租个房间，只是包间比床位的价格高一点。起初，杨珊珊为了省钱租了个床位，和室友相处得挺融洽，可以意想不到的冲突随着一个东北女孩的到来突然爆发了。

一个从东北来北京找工作的女孩住进了这个原本已有五个人的房间。由于生活习惯不同，五个南方女孩总觉得这个北方女孩洗澡次数少、不爱干净，起初大伙还拿这个开玩笑，时间一长，东北女孩不高兴了，进进出出

都板着脸，外人戏称她们宿舍是“两大阵营”。一天下午，四个南方女孩一块儿去澡堂洗澡，另一个南方女孩小忆把钱包扔在床上就去水房洗衣服了，东北女孩拉着床帘躺在上铺看书。洗完衣服，小忆发现钱包里的钱全没了，此时洗澡的女孩们也回来了，五个人一致认为是东北女孩偷了钱，不由分说地围住她，你一言我一语，煞有介事地“开堂会审”起来。“她非说不是她拿的，可当时宿舍只有她一个人，那时候我们想：不是她还能是谁？后来我们吓唬她说要报警，她一点也不发怵，回了句：‘你们就报警吧！你们没资格审问我，让警察来跟我谈。’”五个女孩打了110，警察盘问了东北女孩，可是她一口咬定没偷，也找不到证据，警察只好作罢。

矛盾并没有因为警察的离去而烟消云散，“怀疑重点”仍然只有一个——东北女孩，长达半年多的冷战和排斥由此开始。三天一大骂，小吵天天有。除了平日里不间断的冷嘲热讽，五个女孩甚至使出种种办法让东北女孩过得难受，希望以此逼迫她主动搬走。比如东北女孩在下铺坐着吃饭，她们借口整理床铺，站在上铺拼命抖被子，被子上的尘土纷纷落进东北女孩的碗里。渐渐的，千变万化的整人招数让杨珊珊看不下去了，她悄悄劝东北女孩：“可能我们当初真的误会你了，不过直到现在她们都认为你是你偷的，所以才排挤你。你过得多难受啊，干脆搬走得了。”东北女孩谢过她，还是坚持住着，直到期满。

经过这桩“莫须有”的盗窃案，杨珊珊觉得19岁的自己不再善良，在排挤东北女孩的几个月里，她曾经出谋划策，曾经恶语相向。在一年合约期满的那天，和那个东北女孩一样，她搬出了那个房间。

可是新的房间让杨珊珊又遭遇了“盗窃案”。还没等她熟悉新的室友，一个女孩就冷冷地向全体宿舍人员宣告：“我银行卡里的钱少了2000元，我知道是你们中谁取的，最好赶紧给我还回来，不然后天我就报警！”杨珊珊不禁打了个寒战：“当时我特别害怕。说起来也可笑，我没偷，根本用不着害怕，我就是怕她们说我是新来的，认定是我拿的，被人怀疑的事儿我见过，心有余悸。”第二天，钱居然乖乖地回到了那个女孩

的卡里。熟识以后，那个女孩告诉杨珊珊，其实她发现卡里少了钱的时候就知道是谁取走的，因为之前她曾经和一个室友去过银行，估计是取钱的时候身旁的室友看到了密码。“肯定是她心虚，怕我报警，第二天就给我卡上打了钱。”

两桩“盗窃案”让杨珊珊不寒而栗。于是第三次租房，她主动找到了几个熟悉的女孩，一起租了个包间。“虽然贵点，可是我们对彼此都很信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不用整天防着人，也不用担心被人防着，住着放心。”

生活有着落，虽然艰苦且不是自己理想中的方式，杨珊珊一直在坚持。她喜欢聊她看到的、就在身边的“成功案例”，那些室友或者前辈的故事让她兴奋。他们中有依靠自我奋斗的，也有投机取巧的，更不乏“传奇故事”型的。无论他们经历了什么，杨珊珊都把他们统统归为“特别成功的人”。

杨珊珊有一个室友，也是个自考生，通过两年早出晚归的学习、考证，最终进了一家瑞士企业。“她拿到offer的那天，我比她还激动！”让杨珊珊失落的是，后来那个女孩工作太忙，不再有空与杨珊珊相约逛街、回小月河吃烧烤和麻辣烫。

杨珊珊另一个室友，在参加两届自考落榜之后，经一个好友介绍，去广州和一个素未谋面的男孩相亲，一见钟情，嫁入豪门，成了小月河的传奇人物。“她再没回来，只是在结婚前打电话让我帮她退掉床位，还‘顺便’让我告诉其他姐妹，男孩家里打算花2000万给他们办婚礼。当时我都疯了！拿着手机一遍遍重复：‘2000万啊2000万！’”

2007年中国最红的演员王宝强，是杨珊珊口中屡次出现的小月河人。或许是王宝强曾经和她拥有相同的“小月河人”身份，她甚至对王宝强的任何新闻都保持高度关注和传播热情。“你知道吗？王宝强今年要推出个人自传，主要内容就是他的个人奋斗史，书里会披露他早年的一些照片，我跟你打赌，里面肯定会有他在小月河的日子！”

在杨珊珊看来，“成功”离她不过一尺，将来的某一天，她也会成为其中一员。

2. 茫然的蜗牛

梁 旭

孙延斌时常感叹选专业真不能一时冲动。当年有人劝他选择就业前景好的软件专业，而孙延斌却毅然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硬件专业。在他看来，要学就学自己喜欢的，就业问题不必太计较。但当他毕业之后才发现，兴趣真的不能当饭吃。他只好回过头来重学一门可以用来谋生的专业，但半路出家的就业前景令他十分迷茫。

晚上10点半，孙延斌洗洗便钻了被窝。一闭眼，这世界只剩下“噼里啪啦”的键盘声。同屋的其他四人，都在网络游戏里激战正酣，这会儿睡觉对他们来说还太早。孙延斌揉揉盯了一整天电脑屏幕的眼睛，使劲儿眨巴眨巴，干涩得挤不出一滴水。

在“噼里啪啦”的键盘声中迷迷糊糊入睡，睡了又醒来，这样的日子已近一年，他早就习惯了。“战斗”了一夜的室友清点“战果”，意犹未尽，每一天的“战斗”对他们来说都可以收获比睡觉更多的乐趣和自我满足感。而对于孙延斌来说，太阳还是昨天的那个太阳，小月河也日复一日亘古不变地流淌。

孙延斌家在农村。提起父母的年龄，他多少有些羞涩：“爸妈的具体岁数我也不太清楚，五六十了吧。只记得一个属龙的一个属蛇的。”他们兄弟二人，哥哥属鸡，他属鼠。

小时候，妈妈教哥俩认字，孙延斌总是先学会，可是一顿饭之后，哥哥还记得，他却忘了。在他的印象里，哥哥“天天不学习”、“总是欺负

他”，他不明白这样的哥哥怎么就能考上山西师范大学的本科，又从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一直读到北京邮电大学的博士。

但是上学那会儿，他没有想这么多。他并不在乎自己的学校是否是名校，也不在乎自己读的是专科还是本科。至于能在学校学到什么东西，他更是没兴趣去管。于是，他本以为漫长的大学时光便在一个个懒觉中溜走了。

2007年孙延斌专科毕业。当时他面临一个专升本的机会，只要愿意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上本科。

那时，“天天不学习”的哥哥已经结婚，新嫂子人挺不错。“我嫂子让我上个本科，我哥说，就他这水平？没戏。他说我英语不行。我这英语确实不太成，考了一次四级，没过，就再也没考过。”

孙延斌的同班同学不少，最终却只有一个男生考了本科。孙延斌便跟着大部队进入了社会。“随大流呗，我就是那种人。”

但当他真的走上社会，却发现工作不是那么好找的，好工作更难找。在石家庄上了3000多一个月的JAVA培训班之后，他找了个每月1000块的工作。家里人并不支持他的工作，认为没有什么前途。他年前辞了职，年后又去石家庄试了试运气，却仍旧没有收获，干脆又回家，自己看书。这一呆便是三个月，家里父母倒是不着急，可他的书却越来越看不进去，终于，他再也坐不住了。

2008年5月，孙延斌在哥哥嫂子的劝说下进京了。行李是一床褥子和一条毯子。

当年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嫂子就建议他学软件，他觉得没兴趣，就选了硬件。可是兴趣这玩意儿有时候真不能当饭吃，当初没听嫂子的话，毕业之后果真找不着饭碗。这回还得听嫂子的劝。

哥哥帮他在知春里附近找好了住处，报班的事儿也早已安排好了。

四个月，学费一万元。把这笔“巨款”交付出去的时候，孙延斌终于感觉到自己不再是个大学里的学生，同样是花钱，滋味却不一样了。

在北京最火热的四个月里，孙延斌每日重复着这样的生活：坐在60个

人的教室里，盯着电脑屏幕，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一直坐到脖子疼，汗如雨下。

“那时候是我这辈子学习最认真的时候，比上大学时候认真。”

9月份培训结束，一周后，他成为清华紫光金之盾的员工。上班的前一天，他搬进了小月河一个名为“北京师范大学特色专业”的学生公寓，每月租金250元。

“搬来没几天，我就想搬走了。住在这儿不安全，老丢东西。我们屋就有人丢衣服，第一天晒在外面，第二天就没了。所以我的贵重物品，像银行卡什么的，都放在我哥那儿。”

虽说很想搬走，但他自己都不知道还能去哪，只好先在这里将就着。

清华紫光朝九晚五的工作，比上培训班那会儿轻松很多。公司的食堂也可以满足一日三餐的需要，每日还有10元饭补。周末他就到哥哥那里，让哥哥请客，改善一下伙食。

晚上6点多回到小月河，睡觉还太早，又没别的事情做，他就到附近中国软件经营学院的教室里看看书。“宿舍的人天天打游戏，有时候也拉着我玩。谁不爱玩啊？我老爱玩了。可是到了这儿光打游戏，不是浪费吗？在学校的时候，绝对不会这么认真。现在出来，有压力了。”

“有时候在公交车上，听到一些搞计算机的同行聊天，有些专业名词我听不懂，心理就特别难受。”

现在学习时间少了，反倒更想学习。但是，离开了学校，他再也没有找到系统地学习一样东西的机会，只能在工作中学习和积累经验。

“有的时候挺不知足的，老是对自己不满意。处在一个新的阶段，就有新的想法。”

但就像不满意小月河的居住条件，却又不知道去哪一样，对于工作，他也没有自己的方向。

“他们说，走技术这条路有发展。有发展吗？我不知道。他们说做管理有前途，我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

他默默地想了想，笑道：“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迷茫的默默爬行的蜗牛。”

再过两个月，孙延斌来北京就满一年了。但对他来说，北京仍然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城市。他甚至连天安门都没有去过。

“我哥和朋友带我去逛过奥林匹克公园、天坛、地坛、清华、北大。平时下班后偶尔会去易初莲花逛逛，我在这儿朋友不多，自己也不怎么溜达。”

有人叫他踢足球，懒得去，顶多上新浪网看看NBA。买报纸看新闻，没那习惯。偶尔借本小说看看吧，挺没意思。没有谈恋爱，虽然家里人天天唠叨。连他自己都觉得这生活似乎太平淡了，没有一点儿出彩的地方。

要是公司里事儿不多，闲下来了，他有时会愣会儿神儿，想家，想在家里忙农活儿的爸妈。

“这儿离家有点远，我还是想回石家庄。我听说石家庄要建一个软件园，要是发展，我就回去。我想在石家庄市里买房子安家，那比较现实。”

3. 白天上班族，晚上学生族

张 樱

和阔别7年的高中同学在小月河的“大学村落”相遇，记者以为彼此会尴尬——至少在这种脏乱差的环境下相见，我担心她会有心理负担。实际上，我们聊得很愉快，显然她对目前的生活很满足。

黄琼是位让人羡慕的美女白领，她住在“大学村落”多少让人有点意外。

2004年，黄琼从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英语系毕业，不喜欢南京也不喜

欢上海，她选择到北京工作。家里人不放心她一个人租房子，联系了远房亲戚。亲戚答应提供空房，于是黄琼一来北京就有了免费的房子住。

“和小月河学生公寓比起来，那套房子简直就是豪宅，装修得特别好。可是，那种孤单让我受不了。原来南京的同学大多在杭州、上海工作，几乎没人来北京。一到周末，我就买一堆吃的，在家看两天电视，人都快憋傻了。”亲戚全家人都是医生，有洁癖，每次来都嫌黄琼收拾房子不够干净利落。没多久，有朋友推荐了小月河的“大学村落”，她毫不犹豫地租了个床位，住了下来。

刚到北京时，黄琼在一家外国公司的北京代表处担任助理。办事处人手少，加上黄琼性格活泼、胆大心细，很快就得到了重用，最后老板索性把人事、财务、主管几大职务全交给她一个人。“我很快成了公司的大拿，一般员工跟我说点事儿，都得拿小心翼翼的态度。”3年工作下来，黄琼没了激情。“每天就是机械地完成各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活儿。”

上海一位好友的跳槽让黄琼颇为震动。“她原来是一家外企的助理，每天就是陪女上司参加各种晚宴。她觉得过这样的日子算是白活了，纯粹是打杂和瞎混，学不到真本事。2007年初，她跳槽去了一家外贸公司工作。没想到一年下来，年薪涨到了5万多，比以前足足多出2万元。”黄琼坐不住了。好友的转变、年龄的增长让她迫切感觉到自己也需要某种飞跃。

黄琼想到了跳槽。“那时候，我只是觉得不能再这样没有任何发展空间地混下去，并没有仔细考虑要做哪个行业。”目前，黄琼在一家国际会展公司工作，为国外各种展会联系国内场地、布置会场等。“之前我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完全是一片空白，一切从零学起。虽然每天体力上辛苦一些，思想上却比以前轻松，不用整天想着‘哎呀我这样混下去怎么办’之类的问题。再加上这个领域在国内挺新潮的，我相信将来我会有发展空间。”

黄琼的工作职位、薪金待遇非常好，休闲生活也丰富多彩，和小月河里其他人早出晚归的枯燥相比似乎有点格格不入。

“其实我在北京也没什么大学同学、昔日好友，所以我老出去玩。”

慢慢的，黄琼发现北京是一个休闲设施特别全面、发达的城市。“比如冬天，我可以去京郊滑雪、泡温泉，还可以去卡拉OK唱歌、看电影，在北京，几乎就没有你想得到却玩不到的地方！”

黄琼是个“月光族”，每个月4000多元的月薪，除了支付200多元的房租，她的其他开支都花在吃饭、购物和休闲上。“我的同事、父母知道我住在小月河，都特别惊讶和心疼，老劝我离开这里，出去租个好点的房子，起码可以一个人住一个单间。”黄琼却不愿意，她太害怕孤单了，她喜欢“大学村落”的氛围，喜欢这里的方便、自由。“这里和大学的宿舍几乎是一样的环境。白天上班，晚上重温一把学生的感觉，大伙儿打打闹闹笑笑，就把白天上班的苦闷全忘了。”

谈过一场失败的恋爱，黄琼心目中的男朋友应该是年龄相当、志趣相投的，至于现实生活的柴米油盐她没有或者说不愿意多想。工作、生活在北京，黄琼深深知道自己是这个城市的外地人，她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在这个城市落户安定下来，也许有一天，找到心仪的男友，一起奔向另外一个城市。

4. 过渡时期的日子总要熬

张蕾磊 翟 健

2007年7月，于帆从江西某大学毕业，直奔北京。“我是内蒙古包头人，很不习惯南方的生活，毕业时有机会去广州、深圳工作我都没去。”于帆选择北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在北京上大学，和自己同时毕业。“我对北京不是完全不认识。上学的时候基本一年来两趟，一次待一个星期的时间。大二暑假，我还在嘉年华实习过两个月，算是在北京有过生活经验的。”

于帆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他觉得自己的专业回包头没什么用武之地，他说服了父母，坚持在北京找工作。毕业前面试了两家小公司，于帆最后

都没有签，还想找到更好的单位。答辩结束后，他在网上投了简历找到了现在工作的公司。公司规模不大，他做技术方面的工作，主要负责数据库以及前台的页面部分。

大半年来，他和女朋友都住在小月河学生公寓。“这里就是我的第二宿舍，过渡一下，条件不如大学时候的宿舍，但是还能接受。”于帆月薪2000多元，女友刚找到工作，薪水也不高，无力承担租住单元楼房的费用。

于帆对未来想得很模糊，现在他不考虑北京户口。“这是三四年后考虑的问题，刚毕业就要户口本身就不太现实，如果我能在北京待下来的话，户口以后肯定会有有的。”于帆如此笃信是因为他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他强调公司的技术部主任在北京四年了，已经买了房，马上要买车，工作干得好，所以公司帮助解决了北京户口。“他跟我说，就是要慢慢来，什么事情都有个过程，见的东西多了才能上一个台阶。”

同样学计算机的白清杰，充满了创业的想法。

白清杰个子不高，皮肤黝黑，一副眼镜戴得有些歪，乐呵呵的笑容里透着一股子劲儿。他也是2007年7月毕业的，离开西南民族大学后，他没有回河北南部的家乡，来到了北京。“我的专业是linux系统维护，专业基本决定了我只只有三个地方可以去，北京、上海和广州。”

在北京，白清杰的同学、朋友相对比较少，在他看来，这是刻意地给自己制造困难，摆脱心理上的依靠，用自己的力量面对挑战。摆在他面前的困难的确不少。

第一天到北京，从西站下车后，白清杰迷路了。跟不同的人问路，得到的答案各不相同，他在车站里足足转了一个小时。好不容易出了车站，却找不到要搭乘的927支线公交车站。经人指点，他才知道应该去南广场等车，他却一直在北广场找车站。花了半个小时走向南广场，加上后来等车的时间，他足足用了两个小时才告别西客站。陌生的北京城，纷杂的地名，常常让白清杰头痛不已，对他来说最大的困难不是生活和工作的压力，而是不识路。

容易迷路的白清杰，在人生的道路上始终有着明确的方向。他承认自己对linux技术有种狂热的激情。“linux免费提供给大家使用，有很多志愿者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尽心尽力地在做这项工作，这里面有一种奉献精神在支撑着。”

白清杰在某视频IT公司上班，早上7点离开，晚上8点回到宿舍。住在这里，日常生活开销很少，3000元月薪足够支撑他目前在北京的生活。他早早就规划好了自己的职业方向，在5—10年内，创办一家网站或者计算机方面的培训学校。“这需要技术方面和人脉的积累，因为搞培训的话首先要有老师，老师我已经物色好了，但是启动这件事情至少要5年。”

所以，白清杰格外看重积累和学习。他丝毫不觉得目前居住环境的简陋。“现在的社会大环境太浮躁了，在这里，我反而能沉下来。回到宿舍，我能接触到很多种人，挺好的。”聊天聊得多了，白清杰觉得自己学会了很多人沟通 and 相处的技巧，他认为这对今后的创业很重要。有时间的话，白清杰会在宿舍里练书法，这是他修身养性的一种方法。

“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会被生活所累。”这是白清杰跟记者说的第一句话，他把鲁迅的名言当作自己这一时期的座右铭。5年以后，白清杰会做一个选择，北京或者是成都，做他想做的事业。现在，他在“大学村落”进行自我学习、自我积累。

5. 京城角落里的女猎头

杜韵竹

为了防止自己的设计理念遭到商业运作的冲击，梁亦娴干脆放弃以广告设计谋生的打算。她对自己的评价是：细心，执行力强，有强烈的上进心。当2008年的金融危机来临之时，她的努力和坚决使她从公司的裁员风暴中留了下来。

约访梁亦娴很不容易，因为她总是无法确定约谈时间。用她的话说：“做猎头这行，得跟着对象的时间转。”

梁亦娴是1986年生人，但言语之间老到成熟，俨然一个彻头彻尾的职场人士。她自己对此颇为得意：“第一次接触我的人都吃惊我怎么这么小。看上去不像吧，哈哈？”梁亦娴上大学当了三年班长，做事干练利落，那份与实际年龄不符的成熟，很受班主任赏识。离开学校之后，她就很少再回学校。“我现在很少和学校里的朋友联系，校门是一个槛，出来后思维和视野都很不一样。”

梁亦娴的专业是广告设计。她形容自己的创造全靠灵感：“有可能一个月都设计不出一幅，也有可能一晚上就把好几次的作业全做完交了。”这样的创造习惯和广告公司接件计时的的工作规律很不相符，梁亦娴不希望自己的创意被客户的要求凌迟，在出校门前就果断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我很早就知道不能靠在学校学的这些东西吃饭，上学的时候就一直在找实习做，尽量让自己多接触社会。”

2007年夏天，梁亦娴从北京联合大学毕业，和五六个同学一起搬进了小月河的公寓。“这里的环境和宿舍特别像。”这所公寓的规章制度都贴在墙上，其中有一条规定是晚上十一点半自觉熄灯。梁亦娴笑道：“哪里会有人遵守，也没人检查，只是同室的人睡了就自觉关灯了，回来晚了手脚放轻声些，仅此而已。”

小月河只是为梁亦娴在北京落脚提供了一张床，她的主要社交活动都在小月河以外：“我和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没有共同语言。”不久前，梁亦娴在公司刚升了一次职：“我的朋友都是在工作中认识的，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上，男性居多。”梁亦娴做的是猎头的工作，交际工作必不可少。公司接了业务，她就和符合要求的候选人接触：通电话，聊MSN，慢慢的就熟悉起来。“他们玩的时候就会叫我，一般出去唱歌吃饭都是他们付钱。”梁亦娴觉得她的朋友比她有经济实力，她也很坦然地接受这一点，经济基础的不同并没有影响到相互之间的交往：“可能他们觉得我的性格

和思维方式和他们合得来吧。”

尽管出去玩的时候她不怎么出钱，每月花在交际上的费用也有一千元，占她每月收入的三分之一。梁亦娴说到收入，总会苦着脸道：“钱不够花呀！”据统计，2008年北京职工平均年收入为44 715元，梁亦娴的收入与此相持平。但她的期望月收入为8000元，显然自己与梦想还有很大的差距。

梁亦娴相信自己会有实力获得理想中的收入的：“我的能力比较强，这是我最自信的地方。另外，我很细心，就算是去做扫地这样的工作，我也一定比别人扫得干净。”

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金融危机让大小公司开始裁员，建国门CBD的白领们有了饭碗危机，猎头公司的业务也在减少。梁亦娴的公司陆续有员工离开，她自己却刚刚在2月份被提升。

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梁亦娴曾经自费参加过一个人力资源的培训。她当时在京郊的校区学习，晚上几个人住一个大房子。有一晚一个女生很晚出去没关门。“我被外面的动静惊醒，迷迷糊糊就发现一个男的进了我们的房间。我尖叫起来，同寝室的女生听见我叫也叫了起来，那个男的就跑了。”之后的三个月里梁亦娴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夜里正常入睡，精神一直高度紧张，有一周甚至只正经吃了三顿饭，一下瘦了十斤。男友一直陪着安慰她鼓励她，半年多才缓过来。“直到现在我还特别怕黑，我觉得自己心理有毛病，但就是抽不出时间去看医生。”

这件事她一直没敢告诉家人。“我毕业后就没向家里要过一分钱，家里才放心我在外面工作，告诉他们这些事，只能让他们担心。”

6. 梦想照进现实

杜韵竹

元宵节那天，程光鑫照常上班，工作照常很忙。下班后，他随便吃了点东

西，赶末班车回到宿舍，然后在电话中告诉父母他吃了元宵。程光鑫说，北京的元宵节没有什么过节的气氛。此时的家中，早已经焰火满天了。

程光鑫从小就喜欢相声，他不但自己听，而且跟着广播和录音机学着说，甚至将很多相声段子记下来，一遍遍练习。十多年来，他一直是中学同学中的相声大师，同学们常十几人将他围在中间，津津有味地听他说相声。对程光鑫来说，那段中学时光给了他足够的成就感，在一个个包袱里，他找到了自己的天赋。

本来程光鑫有意做个相声演员，但他的家乡从来没有出过艺术生，他也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他的艺术之路。高考报志愿时，他查到了北影，但那年北影又恰好不在程光鑫的家乡招生。程光鑫只好来到中国农业大学，读了工商企业管理专业。

如今程光鑫眼界比当年开阔得多，回想起2002年那次影响他一生的选择，连他自己都难以置信：“总觉得自己当时稀里糊涂地就到了北京。”

刚进大学的程光鑫对相声还是保持着热情，尽管他并不是艺术特招，却很想在相声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但这点热情很快被泼了凉水。他那浓重的口音，使他的表演大打折扣。同学们常给程光鑫的普通话挑毛病，时间一久，程光鑫都有点不太敢说话了，更别说表演相声。他叹道：“我的自信就这样一点点消磨了，原来幽默也是分地域的。我的热情慢慢消减，现在我会听听相声，但再也不想表演了。”

终结了相声梦想，程光鑫为自己定下另一个目标：去著名企业做管理工作，或者自己创业。可是两年之后，程光鑫发现这些规划从来就没有落到实处。说到底，当初的想法只是一点冲动，冲动过后却没有详细的执行步骤。“那时候上课比较随便，如果碰到喜欢的课或老师就去上，不喜欢的就不去了。像什么金庸小说评论、音乐鉴赏、茶文化、企业管理和讲人际关系的课我就特别积极。数学、英语这样的，我就很少听讲。”

“不过那时也学了很多用得着的东西，想想也不算虚度。比如我以前

喜欢金庸小说和茶文化，现在去做销售，跟客户打交道时，也可以显摆显摆。”有一次去和客户签合同，去了茶馆，程光鑫对茶和茶具都说得有模有样，被客户引为同道中人，聊得很是开心。如今那人已经是程光鑫的老客户了，对他的工作很是照顾。相反，当年学校里那些“正儿八经”的知识，却纯粹是纸上谈兵。“工作中很少用到。有时领导征集意见时，可以拿出来侃侃而谈，搞得很高深，但那些东西与实际工作差别大得很，从来没有真正起到作用。”

到了大四下学期，程光鑫开始找工作了。他有一个专门记录招聘信息的本子，本子上记着各种报刊的名字和出报时间。“这些报刊上有很多求职信息，很多人都买，买得晚了就没了，我怕忘了时间，就全记下了。”

家里人并不希望他在北京打拼。父母都希望程光鑫毕业后直接回老家，考个公务员，这样安安定定地生活下去。但程光鑫对这种意见理都没理。他是一定要留在北京的：一来自己学的专业老家需求并不大，二来他喜欢北京，他说北京比较有文化氛围。

很多同学都是在毕业前就签约，程光鑫找工作却找得非常艰难。一直到毕业之后，他才得到一份工作。在朋友介绍下，程光鑫搬进了小月河。小月河很乱，宿舍里七八个人，也很挤，但他并不在乎：“我白天总是在外面忙，回宿舍的时候都八九点了，第二天一大早又得早走。所以这里对我而言就是个睡觉的地方。”

程光鑫的工作偏重于技术，上手比较难，不过同事们对他都不错，常带他做业务。大家相处得特别好，下了班后常去喝酒、K歌。尽管收入不多，做了近两年，月薪才一千五，但刚工作那会儿，并没有什么生活压力。那段时间很快乐，快乐得他并不觉得收入多少有什么区别。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程光鑫的生活态度也慢慢地发生着变化。两年以后，经济上的窘迫促使程光鑫换了一份月薪3000的销售工作。“刚毕业那会儿，大学同学们常常聚会，但现在聚得少了。有几个同学混得不错，已经有房有车。”人比人气死人，程光鑫突然意识到，自己年龄也不小了，

该考虑房子和车子的问题了。

换了工作之后，程光鑫开始更加努力打拼。每月算上销售提成，他最多可以拿到三四千。不过在北京的房价面前，他仍然没有一点信心。现在，以前和程光鑫一起住在小月河的几个朋友已经搬了出去，其中很多人都是因为收入有所增加，可以去租住更好的房子，也有人实在是受不了嘈杂的学生公寓。程光鑫笑着说：“他们喜欢清静些，但我比较喜欢热闹，不怕吵。”

7. 有心的过客

张蕾磊

王婷在小月河住了大半年，她现在很犹豫，自己设定的一年期限快到了，是不是要延长一年，继续在北京边工作边学习？

王婷中专毕业后就开始参加自考，考完大专，紧接着考专升本，在北京某大学上了2年脱产的成人高考班，学的是管理。其间，她看到同学们都报考注册会计师，就跟着一起报了名。注会考试难度比较高，5年时间内完成5科专业考试，消磨了很多人报考时的雄心壮志，王婷却悄悄地坚持着。

她顺利拿到本科学历，回到家乡——河南某县城。家里人找了点关系，王婷便在当地的一家事业单位上了班。她没有放下注会考试，每当郑州有老师来宣讲科目，她就赶一个多小时的路去听课。王婷用4年时间考完全部课程，当拿到证书后，她决定去北京。“我虽然拿到了注册会计师，但是我不是学金融的，我想把学的这些东西实践一下，在家乡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要去北京。”她选择北京的理由很简单：“那里有同学，好歹有个落脚的地方。”

2006年底，王婷在网上发简历找工作，她只求找个北京的事务所当助

理，很快她收到了面试通知。面试很顺利，事务所当即要派她去山东出差，王婷算了算，完成项目来回要20多天。“我临时请的假，肯定不行，所以就拒绝了。”她买了3天后的火车票，要走的那天又有公司让她去面试。“算算时间来不及，我就去面试了。他们让我做了一些表格，我把小数点输成了逗号，表格怎么也弄不好，折腾了一下午。”完成了表格，王婷着急赶火车，忘记拿挂在门后的棉服，等她跑回去拿时，公司的人都笑她有心要留下。

为了办停薪留职，王婷耐心地等待新旧领导完成交接，熟悉工作，一等就是半年。要找领导谈话那个上午，她一直在走廊和窗口观察领导办公室，总是有人进进出出找领导，同事说她像热锅上的蚂蚁。11点半，大家都吃午饭去了，王婷堵住了领导，“借一步说话”。

王婷家孩子比较多，父母对她并没有太多要求，大多时候是她自己拿主意。办好停薪留职，在网上发了求职信，王婷没有等待任何回复就提前买好了北上的火车票。“我是6月30日的车票，6月29日有公司打电话让我去面试。”在火车上晃了一夜，下了火车王婷就赶去面试，并在这家公司留了下来。

刚到北京时，王婷借住在同学那里。某天，她在二里庄办公交卡，发现附近有学生公寓出租。王婷打听了一下，一个床位半年两三千元，她觉得太贵了。有人建议她去小月河看看，王婷就这样找到了小月河学生公寓群。“半年1500元，免水电费、有空调、有电视、免费洗澡，很值，所以我就搬过来了。”王婷满足地说。

每天朝九晚五地工作，上班时间安排得很满，下班回来，王婷就想好好休息。“回到这里很放松、很热闹，大家聊聊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王婷月薪3000元，不算床位费，每月的开支在500元左右。她在北京只有一个重心——工作。“我到北京就是为了学习。在这里，我一天干的活儿是原来那里一个月的活儿，那些书本上的内容落实到了工作中，我要学、要应对的东西太多了。跟准备注会考试比，那时一个月学的还不如我

现在一周学的多。”王婷笑着说。

对王婷来说，北京大多数时候是陌生的。要出外勤的时候，她会提前在网上查好行车路线。平常她基本是公司、宿舍两点一线的生活。王婷不打算在北京生根，她原本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年纪越来越大了，女孩子总是要过稳定一点的生活。我是肯定要回老家去的，现在我在想要不要多给自己一年时间，因为处理大项目我还是有点吃力。”王婷淡定地说着自己的未来：回了老家接着在单位上班，找些给公司做账的兼职。

（本文中《这里不缺成功传奇》、《白天上班族，晚上学生族》、《过渡时期的日子总要熬》、《有心的过客》四篇文章均转引自《大学生》2008年第5期）

第三篇

走进“蚁域”

“蚁族”带给“80后”的是什么？

当“80后”遇见“80后”，当在校生遇见毕业生，当憧憬发现未来，当理想踏进现实，当稚嫩碰触坚硬——当调研员们走进“聚居村”，他们如何面对这些不久前的“同学”？